

重走玄奘之路

◎薛静

感叹：当年阿姆河上没有桥，但很容易穿过河流，现在这里有了桥，然而到达河对面却绝不可能。再比如，玄奘西行目的地那烂陀，当时有全印度最大的寺院，来自各地的学者们聚集到一起，开展各种交流辩论，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现在，理查德只能去城郊，在种着蔬菜稻谷的农田里与几个来学习的外国人聊天。他试图学习冥想，听见的是鸟儿在歌唱，有人在刮擦水壶，摩托车发出突突声，路上女人们叽叽喳喳聊着天，脑海里想的是脏兮兮的动物在垃圾堆里觅食。他希望和其他人讨论一下玄奘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可谈完之后，内心的怀疑却更多了。

“你觉得玄奘想要找到什么？这些哲学又有什么用？”理查德问对方，同时也在问自己。尽管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些国家，尽管对这些地方有很深的见解，尽管出发之前并没有产生精神困惑，但一路走来，从飞扬的尘土、炎热的天气、热情的人群、守信或不守信的交往中，理查德的一些想法还是在慢慢改变。他不相信婚姻，也不喜欢家庭，认为“家意味着承诺，承诺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可后来折返回中国，坐在从敦煌驶往西安的列车上，看着不断退后的群山，他想的却是：“母亲、姐姐一家，那是我想念的家。”结束旅途后，他和中国女友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通过旅途，他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进而改变自己。

理查德师从费正清学习中国文学和历史，1972年第一次到中国，1980年任《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他对中国文化很了解，熟读《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西游记》，但客观来说，旅行中，他身为欧美人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依然

在一些细节中不自觉流露出来。最后一段行程的中国司机很热心，可他怀疑对方另有目的，觉得对方的笑容“假惺惺”，认为司机想从他身上捞钱。这种心情可以解释为历经4个月的舟车劳顿，加上旅行结束在即，他心情浮躁不堪。可又怎么解释，面对精美的敦煌壁画，他想的不是壁画的历史价值，而是为偷盗壁画的强盗斯坦因、伯希和辩解呢？归其本质，还是偏见思想作祟。他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忘记了中国人的角度、中国历史的角度、中国文化的角度。强盗就是强盗，更何况被偷盗走的历史文物，并没有被好好对待。藏经洞的百年悲切，最终还是由中国人扛下了。

当然，也无需因为这些内容就否定这本书。尽管不情愿，可理查德最后还是别别扭扭地承认看错了司机，在“被打败了，被超越了，被羞辱了”的心情得到了解脱。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了20世纪末中国大地上处处涌动的蓬勃活力，与第一次来中国时截然不同。最重要的是，理查德悟到的旅行意义更加接地气：花一点时间思考，确保生命不会毫无意义，未经反省地匆匆流逝。找一段时间离开生活的惯常轨迹，战胜人到中年的踌躇犹豫，像年轻冲动之时那样勇敢上路，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胜利，但也是这些生活里看似格格不入的部分，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有趣。

李硕在《历史的游荡者》中开篇明义：人都要结合自己的阅历、认知去读书，要读“一手材料”而非“二手研究”。读完《究竟之旅》，我想，是时候翻开《大唐西域记》，去走一趟属于自己的究竟之旅了。



书名：粤食记
作者：三生三笑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内容简介：书中讲述了粤菜传承人老麦漂洋过海，经过打拼创办了立行饮食集团的故事。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老麦的独生子麦希明及其搭档程子华回国开拓业务，邂逅了“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茵。四个志同道合的人一拍即合，投身于粤菜行业，并最终带着全新改良过的粤菜建立了新型餐饮文化王国，演绎出了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国故事。



书名：杀死一只知更鸟
作者：(美)哈珀·李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三个孩子平静的生活被两桩冤案彻底打破。传闻与事实，坚强与软弱，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他们在痛苦与矛盾中艰难地拨开生活的重重迷雾，见证了人性的污秽与光辉，理解了真相的残忍与无奈，也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与真情。



书名：百年孤独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本书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反映了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作品融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巧妙地糅合了现实与虚幻，展现出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本栏目由市图书馆协助)

土地悲悯

◎牛钟顺

当电视剧《生万物》的热潮席卷荧屏，原著小说《继续与决绝》的文学肌理也再度被大众审视。这部诞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长篇力作，以沂蒙山区天牛庙村为坐标，在四代人七十年的时空纵深处，将土地变迁与人性挣扎编织成一部沉痛而壮丽的乡土史诗。读者中的有识之士称其为中国当代文学无法绕开的翘楚之作，其文学价值可与《白鹿原》等佳作比肩。

这种评价并非虚言——在其作者赵德发先生的笔下，土地不仅是生存的根基，更是检验人性、道德与时代精神的试金石。小说开篇便以“宁家的家运是用女人偷来的”这一极具民间传奇色彩的传言，将土地与人性欲望的纠葛抛入读者视野。1927年，首富宁学祥为保住祖产，在长女绣绣被土匪绑架时拒付赎金，转而让次女代嫁。这一抉择，将土地的“神圣性”推向极端：当土地成为家族存续的唯一筹码，人性温情与伦理底线便被无情碾碎。

当然，这种“土地崇拜”在小说中呈现出双重性。一方面，它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另一方面，土地又是束缚农民精神的枷锁。传统农民对土地的依恋，本质是对确定性的渴望，而当这种确定性被历史洪流冲刷时，个体的无力感便成为时代最尖锐的注脚。

而土地政策的反复更迭，更将农民推向命运的漩涡。从“永佃权”斗争到“分户单干”，从“两田制”到“经开区”及田野耕种中的机械化，铁头父子作为土地政策的“代言人”，始终在政策与现实间挣扎。他们的命运轨迹，折射出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

如果说土地是这部小说的经线，那么女性命运便是其纬线，二者交织出乡土社会最残酷的生存图景。宁绣绣的遭遇堪称女性悲剧的缩影：新婚前夕被绑架，父亲为保土地弃她于不顾；逃回后被迫嫁给残疾的封大脚；收留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的女儿，却目睹哥哥活埋村干部的暴行。她的坚韧与抗争，在男性主导的乡土社会中显得尤为珍贵——拒绝土地陪嫁，跳进坑中阻止活埋，收留孤苦无依的亲人。这些行为已超越了传统女性的角色定位，是为人性光辉的闪现。

相比之下，费左氏的结局则更具悲剧性。作为传统伦理的坚守者，她在自己亲手抚养长大并视为己出的小叔子费典典与苏苏离婚后，遭遇苏苏的强暴。为自证“贞洁”，她亲手毒死苏苏和与其私通的苏苏后自尽。这一极端行为，暴露出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是多么地深入骨髓。作品通过费左氏的命运，深刻揭露了“贞洁”观念的虚伪与残酷。

但小说并未将女性完全置于受害者位置。苏苏的反抗更具现代性：她与郭龟腰厮混，虽被视为“堕落”，却是对包办婚姻的无声反抗；其私生女半丫的成长则象征着新一代女性的觉醒——她离开村庄，试图在更广阔的世界中寻找自我。如此女性形象就构成一个光谱，从沉默牺牲到隐秘反抗，再到主动突围，映射出中国农村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嬗变。

除此之外，这部小说对历史暴力的描绘亦是颇费笔墨。地主“还乡团”反扑时，对贫农的报复更为血腥、活埋、挖祖坟及分老婆等行径，将人性之恶推向极致。这些场景即昭示了在权力真空与阶级对立中，暴力会迅速异化为群体性的疯狂，手段非常残酷。

但小说并未沉溺于暴力叙事，而是在人性深渊中寻找救赎的可能。宁绣绣收留孤苦的行为，封大脚终老前对土地的释然，铁头在土地政策变动中的坚守，都暗示着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性的微光也从未熄灭。尤其是小说结尾，大脚老汉在雪中看见“白莹莹的小东西在飞动”，这一开放式意象象征着生命的轮回，也隐喻着希望的存在——当土地不再是束缚，当个体摆脱对物质的执念，人或许能在精神层面获得自由。

笔者知悉在某些文学评论者那里，这部小说常被归入新历史主义范畴，但其核心仍是现实主义。因为作者摒弃了传奇化的叙事套路，转而用细腻的笔触刻画日常生活的质感。绣绣被绑架、苏苏代嫁、封大脚开荒等情节，虽具戏剧性，却被置于土地变迁的大背景下，成为检验人性与时代的试金石。

如前所述，当《生万物》将小说搬上荧屏，原著的文学价值即再度被激活。电视剧对原著的改编，虽弱化了部分残酷细节以及对某些人物命运走向的转换，而且只表现了原著七十年的跨度中的二十年，却也通过影像语言强化了土地的象征意义。但阅读原著，仍能感受到文字独有的力量——那些对土地质感的描写，对人物心理的剖析，都是影像难以替代的。为此本书作者没有将农民简化为“受害者”或“顺应者”，而是通过复杂的心理刻画，揭示出他们在生存压力下的道德困境与精神成长，展现了农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动选择。

总之，这部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再现了一段土地变迁的历史，更在于它揭示了历史背后的人性逻辑，这才是文章的动人之处。



公元629年，玄奘为了寻求佛学真谛，横穿亚洲开启了一场史诗之旅。一千三百多年以后，来自美国的汉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从西安出发，穿过丝绸绿洲，攀越崇山峻岭，途经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最终抵达印度那烂陀，而后折返中国。

这是两个人隔着千年历史时光的相遇。玄奘西行，是为了解决佛教要义说法不一的困惑。1999年，理查德西行，却首先承认自己并不期望寻求终极真理。那些旅行类书籍开头的写作手法诸如经历了精神或爱情的危机等等对他也并不适用。理查德的生活没有分崩离析，也没有戏剧性的突发状况，之所以进行这次旅行，是他已年过五十，只是想趁着现在还有时间和精力，赶紧把这件事完成而已。这种写作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了作者为解开思想迷茫而陷入的自我辩证，读者可以跟着理查德以相对客观的角度看待沿途国家的兴衰。

比如玄奘当年从铁尔梅兹渡过阿姆河进入阿富汗，翻越兴都库什山，参拜巴米扬大佛，在喀布尔停留，再进入巴基斯坦。但到了理查德这里，因为时局影响，铁尔梅兹与阿富汗之间的边境已经关闭，他只能走到桥边，隔河遥望阿富汗而



一部藏在数字里的文明史诗

◎刘鑫

葛剑雄教授著作的《中国人口三千年》，以人口为线索，把那些户籍数字化作耕田的农夫、戍边的士卒、迁徙的商旅，在时光长河里演绎着文明的起落。

循着“基础—历史—婚育—近代”的脉络，书籍的结构徐徐展开。基础篇追溯周代户籍制度的雏形，让读者懂得古代户籍普查，藏着赋税、兵役的政治博弈。历史篇则勾勒出清晰的人口增长曲线：战国中期的两千五百万人口是文明的初啼，汉唐的六七千万人口是盛世的铺垫，北宋的一亿人口是经济繁荣的见证，乾隆年间发展到三亿多人口，则是农业革新与政策宽松共同催生的人口浪潮。这种叙述方式，体现出了既见树木，更见森林。

人口是掌握真实历史的一把钥匙。秦代重农抑商，本质是用政策锚定农业人口，为大一统王朝筑牢根基。汉武帝连年征战，史载“户口减半”，昭示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烈。而盛唐开放包容，数百万外族人口的涌入，带来了农村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嬗变，成就了“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繁华。

婚育篇的叙述，贴近每个时代的民生温度。古人“多子多福”的观念，反映了农耕社会“人丁兴旺，则家业兴”的境况。书中提及的汉代“产子免役”，唐代“妇人正月产子免租调”等政策条文，蕴含着对人口繁衍的朴素期盼。可是即便如

此，“传宗接代”仍充满艰辛，医疗匮乏、灾荒战乱，让“生子不易，成人更难”成为常态。

纵观三千年，中国人口政策始终随时代需求动态调整，而每一次调整，都深刻影响着社会走向。古代的“鼓励生育”，是因农耕文明需“人丁”支撑赋税与劳役。近代的“节制生育”，是因新中国成立后人口激增与资源有限的矛盾。如今的“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则是应对老龄化、少子化的主动作为。这种政策迭代，是对“时移世易，变法宜矣”的生动实践。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曾为缓解人口压力、推动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而近年来，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从发放生育补贴到落实带薪产假，从建设普惠托育机构到推进教育“双减”，一系列政策调整，试图在“鼓励生育”与“减轻家庭负担”间找到平衡。

优质人口政策，需兼顾“数量”与“质量”，只有这样人口红利才能转化成发展机遇。古代虽鼓励生育，却因医疗落后、教育匮乏，难以提升人口素质。如今我国通过政策引导生育，通过九年义务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持续提升人口质量。人口不仅是劳动力，更是文明传承的载体。唯有让每个生命都能享有健康与教育，才能让人口红利真正转化为发展动力。

对于如何破解生育意愿下降的问

题，我们可以关注古人的生育意愿是什么样的，以及用了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让我想起书中记载的清代“摊丁入亩”政策。正是取消了按人口征税的制度，才释放了生育潜力，推动人口从一亿增至四亿。优质的人口政策，不仅要“鼓励生”，更要“帮着养”。如今各地推行的生育补贴、房贷利率优惠、托育服务补贴等措施，正是循着“减轻家庭负担”的思路推进。但若真想真正扭转生育意愿，还需在教育公平、住房保障、女性就业权益保护等方面持续发力，让“生得起、养得好”成为现实。

所谓历史，从来不是帝王将相的独角戏，而是亿万普通人用生命书写的壮阔史诗。所谓政策，也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对“人”的尊重与关怀，是让每个生命都能在时代浪潮中，拥有生长与绽放的力量。“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在人口史中得到最鲜活的诠释。秦亡于民力枯竭，唐兴于人口繁盛，明衰于民生凋敝……历史反复证明，善待人口，就是善待国家的未来。那些在迁徙中融合的族群，在耕织中繁衍的家族，在战乱中坚守的生命，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底色。

读《中国人口三千年》，不是为了沉湎过去，而是为了看清来路。书中那些关于人口与政策、人口与文化、人口与经济思考，为我们应对当下的老龄化、少子化挑战提供了历史镜鉴。



剧院之声

茶馆

经典话剧《茶馆》将于12月12日在潍坊大剧院上演，《茶馆》自1958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后，成为中国话剧的保留剧目，曾多次出国演出，享有国际声誉。它不仅是老舍的代表作也被视为中国现实主义话剧的巅峰之一，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记者 付东升 整理